

乡村内源式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以临沂市兰陵县代村社区为例

石振玲¹, 石秀秀², 汪修勇^{3*}

(1. 兰陵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山东 兰陵 277700; 2.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 南京 210036; 3. 莒县浮来山地质遗迹保护管理服务中心, 山东 莒县 276500)

摘要:某些地区,片面强调政府主导、资源下乡的乡村治理往往内源动力不足,村民增收乏力。在乡村内源发展的理论渊源分析基础上,从本土化的社会动员、依托本土可持续资源、发挥农民主体地位等方面挖掘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构建内源式乡村发展理论框架,总结了内源式发展的4个关键要素,即社区组织、乡土资源与文化、村民参与、利益分配机制。结合临沂市代村社区的发展实例,对乡村内源式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动力机制进行实证研究。

关键词:内源式发展;动力机制;社会组织;乡土资源;利益分配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28/j.issn.1672-6979.2022.08.013

引文格式:石振玲,石秀秀,汪修勇.乡村内源式发展动力机制研究——以临沂市兰陵县代村社区为例[J].山东国土资源,2022,38(8):74-78. SHI Zhenling, SHI Xiuxiu, WANG Xiuyong. Study on Dynamic Mechanism of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 Setting Daicun Village Community in Lanling County in Linyi City as an Example[J]. Shandong Land and Resources, 2022, 38(8): 74-78.

0 引言

长期以来,以牺牲农村利益为代价的“城市偏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促使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生成与固化,乡村空心化、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城乡二元化等现象愈发严重。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契机。

从乡村治理的历史来看,国内政府对于乡村的治理往往是以一种单线性行政推动为主,从最初的“城市利益让渡”理论到强调“企业家责任主动作为”,到“有效的制度供给”,都强调了行政推动的作用。政府推动的外源式发展在乡村发展中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内源动力不足,片面的强调政府主导、资源下乡往往效率低下,村民增收乏力。后来学者们又纷纷尝试从内源式发展的角度探讨研究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动能机制,及乡村发展“自下而上”的转换“自我导向式”的发展^[1-5]。

从中国的乡土文化发展历程看,中华民族古老的农业文明,使得农民对土地产生了一种依赖与深厚情怀。乡村治理必须要突出土地这一资源和情怀。乡土意味着本土的资源、乡人代表着本土的群众自发性,文化是乡土人共同的认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两个重要的概念,熟人社会代表着资源动员及资源聚集,人情则是人员动员。如何完成本土化的社会动员,依托于本土的可持续生态资源,发挥农民主体地位,挖掘出内生动力,完成村民致富,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

1 乡村内源式发展的理论渊源

1.1 乡村内源式发展的历史背景

早期的区域发展理论主要围绕城市发展而展开,19世纪50年代佩鲁提出增长极概念并被布戴维尔用于地理空间研究开始,城市—工业增长极这

收稿日期:2021-07-20;修订日期:2022-06-27;编辑:曹丽丽

作者简介:石振玲(1983—),女,山东临沂人,工程师,主要从事土地管理;E-mail:shizhenling0417@163.com

* 通讯作者:汪修勇(1974—),男,山东莒县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国土资源方面工作;E-mail:wxy19740509@126.com

种自上而下带动功能一体化经济发展模式被广泛实践并极大推动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农业的落后、贫富的悬殊等一系列问题不断暴露。西方激进学派如弗兰克和沃勒斯坦提出了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点就是一个地区发展剥削另一个地区,是中心—边陲的结构。边陲国家并不是因为贫穷而依附,而是因为依附而贫穷。70 年代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矛盾日益凸显,长期的城市—工业的增长模式受到质疑,区域发展理论转向了自下而上的内源式乡村发展,比较典型的的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逊的城市等级体系发展理论,试图通过集镇建设规划和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城市向农村的辐射,带动农村发展。罗迪耐里通过建立空间联系形成空间城镇系统,在主要的乡村区域建立三级城市聚落,即乡村服务中心、小集市、区域中心,并在这一等级中建立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使不同的城镇服务于不同的区域范围,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和扩散效应。这两种理论在实践中并没有获得实际的成效。1975 年弗里德曼提出“农社区战略”及其 4 个必备的条件:①存在农社区的政府单元网络;②权力下放,单元自主权;③实现土地改革以保证财富回到单元的成员控制中;④中央政府必须在财政、物质和技术资源上给予支持。1977 年史特尔提出的“选择性空间封闭战略”,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从世界或全国经济体系选择性脱节出来,进行区域性关闭,将权力下放至地方和区域并以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式与外部进行联系,以便小城镇按照自身的规划进行资源开发,又能有效避免较大经济中心有害的回吸效果。这两种战略批判了中心—外围模型,城市—工业增长的功能区域规划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活动区位,以乡村城镇为核心的地域型规划能将区域内人力和自然资源进行综合动员,是区域规划决策的内源动力,更着重于社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和综合控制力。弗里德曼的农社区理论更适合较低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较大的亚洲和非洲地区,与乡村内源式发展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强调发展过程由本地控制,发展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收益保留在本地^[6-13]。

1.2 理论和概念的提出

乡村内源式发展理论和概念最早是 1969 年日本学者鹤见和子提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1977—1982 年中期规划对“内源式发展”的概念进

行了阐述,“一个地区应依靠当地的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居民的知识 and 创造力,在内部寻找发展的动力,探索适合当地的、具有特色的发展途径,而不是简单地从外部移植”。同期,日本经济学家宫本宪一批判了依靠外来资本介入的外源式发展模式,提出内源式发展应当遵循当地人根据当地的产业和文化对发展进行规划、建立居民参与制度、发展有高附加值的地区产业链等原则;之后,学者们纷纷对内源式发展开展研究,如清水治久以小川町为例对现实中内源式发展的实践进行了说明;意大利学者 Picchi 等对乡村发展的案例研究,提出了内源式发展的六大要素,Lowe 强调了地方参与、地方认同培育、当地乡村资源利用三个方面。国内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较少,且多停留在理论基础的总结提炼上,最初,杜书云等通过对失地农民的生计分析,指出外源式发展只能在短期内缓解生计困境,而内源式发展才能使农民真正受益;于建嵘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出发,强调乡村的“政府—乡村社会组织—公民”的多主体协同共治,张文明等从资源、参与、认同等三维视角出发强调内生发展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后期逐步深入至理论框架、关键要素、内在机制和乡村案例结合的实证研究,明确了外部力量和内部因素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张玉强等在对国内外研究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内源式发展的 3 个基本要素,即资源内生、组织动员、身份认同,同时明确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地方力量扮演促进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上海市 Y 村的案例进行了论证。王怀禹等提出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 4 个基本要素:即资源内生、生态智慧、乡村文化和村级治理,同时明确了政府、社会服务组织以及市场等超地方力量在乡村振兴中具促进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定位,构建出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理论框架;最后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行政推动和强调乡村内生性力量培育的内源式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基本脉络^[14-20]。

2 乡村内源式发展动力机制的关键要素

根据国内外乡村内源式发展研究理论成果,结合国内乡村发展实际特点,本文借鉴弗里德曼的“农社区发展”理论将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概括为社区组织、乡土资源与文化、村民参与、利益分配机制(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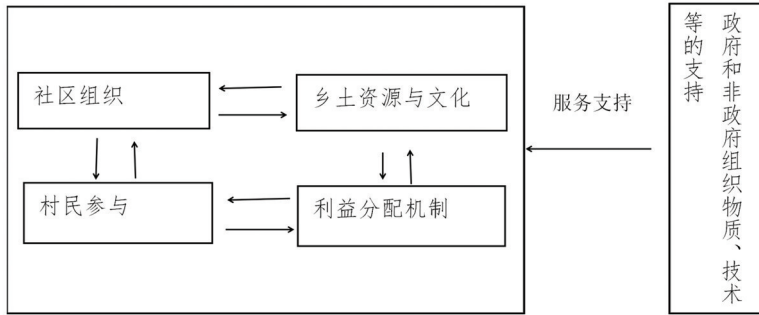


图 1 乡村内源式发展的理论框架

2.1 社区组织

社区组织是乡村内源式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社区组织既包括有效的组织机构、组织形式，还要有组织能力。一是相对独立的空间形态，比如一个自然村；二是坚实有力、管理完善的行政组织，比如村委领导班子；三是有创新意识有头脑的乡村精英，对国家政策有精准把握，可以争取政策及政府资金支持，又兼具管理才能。在整个乡村发展中，有效的社区组织贯穿始终，是能否实现乡村发展的关键。

2.2 乡土资源与文化

乡村发展主要是依托本土资源和本土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创造，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公众参与。乡村熟人社会的具体场景，是乡村和城市发展路径不同的主要原因。一要探索挖掘本土资源和乡土文化价值，二要在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建立产业发展规划和相关制度，注重形成种植业、加工业、观光旅游业等多业态融合的产业链条，将乡村各资源要素叠加、融合，形成整体效应。规划决策和制度完善要体现村民自主协商和决策，保证村民的主人翁地位，两项要求缺一不可。

2.3 村民参与

全民获得感，实现人民安居乐业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之一，村民是乡村发展的落脚点，是验证乡村发展成效的根本和关键，只有唤醒他们的乡土意识和乡村情感才能重拾群众自信，改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人微言轻的”参与感缺失，才能真正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村民有参与权、知情权，决定了他们参与乡村发展是否有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和发展的有效性。

2.4 利益分享机制

利益分享机制是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保障，“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才是群众参与的内在激励，其建立需要一系列规章制度的约束来保证。一是“土地等集体资产的确权入股”，做到“家家有资产，户户有股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保证“人人有就业”，乡村发展创造的就业岗位优先考虑本村人就业；三是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

2.5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物质、技术支持

乡村内源式发展强调的是内生力量在前，同时把握好外部力量的介入程度和角色定位。信息、技术等稀缺资源难以内生，单纯依靠内生力量不足以撬动乡村发展。政府可依托政策、资金等多重优势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及制度供给方面提供保障，如江苏的“万企联万村”就是一种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共享，同时又不存在权力的控制，更强调了乡村发展的自主性，凸显了政府政策的服务和支持角色。同时，非政府组织在技术知识服务理念等方面提供支撑，内外结合，共求发展。

3 案例实证研究

乡村内源式发展关键要素中，社区组织的前提和关键性作用，在临沂市代村社区的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20 世纪 90 年代，代村社区背负高额债务，是当时典型的穷乱脏、人心散、秩序乱的村庄。1999 年，新村委班子的成立成为代村社区实现从穷乡僻壤到“中国美丽乡村”“最美休闲乡村”“全国休闲农庄”以及村民收入连续翻番的华丽转身的起点，也成为了代村实现发展的前提，是坚实的基层党组织带头攻坚克难，带活了散漫的人心，引导村民参与自治，盘活了乡土的资源，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分享机制。

3.1 基层社区组织成为乡村发展坚实战斗堡垒

代村社区新一届党委领导班子的成立是代村发

展的转折点,而党委书记作为领导班子的“领头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走访调研、慰问动员,调研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土地,解决人地不均、家庭债务问题,让村民的利益诉求得到了合理的表达。乡村善治依赖于乡村良好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以及乡村场域内利益诉求和价值的合理表达。新的行政组织抓住了群众关注的核心问题,采取了群众认可的慰问方式,解决了群众的后顾之忧,从每户动员的点辐射到村集体的面,为进一步乡村发展的群体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乡村发展的关键点之一。

3.2 立足本土资源和本土文化探寻优势产业发展

(1)依托传统农业资源,发展种养业和现代农业。将养猪场、养牛场、养貂场逐步盘活,相继流转全村和邻村土地近万亩,建成山东省现代农业示范园。通过加强招商引资,科技引进,产品出口,形成花卉苗木生产基地、出口农产品基地、高档有机蔬菜基地、草莓生产基地等多个现代农业发展基地。推广“增产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调”的生产方式,打造“展示与推广、质量与效益”并存的产业格局。园区内先后引进国内外蔬菜、花卉等作物新品种 500 多个,辐射推广面积 41 333.33hm²,逐渐发展为采摘园、休闲园区、农家乐、休闲农庄。

(2)依托乡村劳动力,大力发展建筑服务业和商贸物流。通过有效的产业布局规划解决了全村劳动力就业问题;通过商户招商,促进了农户创新创业。将建筑队组建为建筑公司,借着新农村建设政策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支持,负责旧村改造项目、村庄绿化、道路硬化、环境美化、污染治理等多项行动。通过旧村改造腾出 40 余公顷建设用地,依托区位优势建成苍山县农村交通物流分拨中心,物流辐射全县所有乡镇,有效增加了集体收入。村集体建设代村商城,占地面积 20 万 m²,经营面积 16 万 m²,接纳商户 2 000 个,年交易额达到 100 亿元,进一步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

(3)依托沂蒙文化发展文化旅游业,先后打造“兰陵国家农业公园”“沂蒙老街”和“印象代村”,农旅融合进一步提高乡村知名度。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2019 年全年共接待游客 120 万人次,其中散客 83 万人,团队 37 万人,实现旅游总收入 1.59 亿元。依托农业公园客流量,进一步发展产业链条,先后建设“沂蒙老街”、“印象代村”发展

兰陵夜文化。“印象代村”投资 2 亿元,占地 6.67 hm²,是沂蒙老街的升级版,项目建有代村村史馆、新天地礼宾楼、民宿、小吃、百货等 9 大功能区域,入驻店铺 400 多家,具备“成熟商业圈”“历史文化圈”“休闲娱乐圈”等功能。

3.3 加速构建村域社会网络

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代村的决策权归村民所有,并落实到各项制度上。

(1)推行“四议四公开”工作法。重大事务一律采取“党组织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决议”模式,做到决议公开、村务公开、实施过程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2)建立“三角章”财务监督审核制度。将一个公章平均分为三份,分别由该村 3 个片区的村民推举一位代表掌管,只有在 3 个代表均对某财务决议无异议时,一起盖章才通过财务审核,此举切实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大大提高了广大村民参政议政积极性。

(3)注重完善村风民风。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坚持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剔除传统的不良习俗;开展多项“好媳妇、好婆婆”家风评选活动;建立完善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引导村民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营造社会主义新风尚。

3.4 “人人可得”的利益共享机制

坚持“四有”发展理念,“家家有资产、户户有股份、人人有就业、年年有分红”。坚持“创业招商”村民优先,代村的新天地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既是村集体的股份制公司,也是全体村民的一个公司,村民在公司里有多种就业形式,代村社区管理服务团队、代村商城服务团队、示范园区的服务团队、建筑装饰团队均是村民自己的团队。坚持发展成果落入村民口袋,村支部通过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保政策,每年向群众发放生活用品、住房补贴、支付新型合作医疗金、居民子女助学奖学金,60 岁以上老人免费入住老年公寓。从群众就业、教育、就医、养老、住房等多方面提升村民生活水平。

4 结语

构建了乡村内源式发展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乡村发展的 4 个内生要素,并通过对代村社区发展的

实际案例分析,进一步验证社区组织、乡土资源和文化、村民参与和利益分享机制等内在要素在乡村发展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同时,政府政策优势和非政府组织的宣传引导,信息共享等资源在代村发展过程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生发展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1-15.
- [2] 鹤见和子.“内发型发展”的理论与实践[J].江苏社联通讯,1989(3):9-15.
- [3] 宫本宪一.环境经济学[M].东京:岩波书店,1989:296-303.
- [4] 李仁贵,张健生.国外乡村学派区域发展理论评介[J].经济评论,1996(3):67-71.
- [5] 周大鸣,刘志扬,秦红增.寻求内源发展[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1-15.
- [6] 王小广.新旧动能转换:挑战与应对[J].人民论坛,2015(35):16-18.
- [7] 刘凤良,章潇萌.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动能切换与结构转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5):2-11.
- [8] 杜书云,徐景霞.内源式发展视角下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困境及破解机制研究[J].经济学家,2016(7):76-83.
- [9] 喻小雨,崔迎春.过疏化背景下的日本乡村地区内源式发展研

- 究[J].世界农业,2018(12):6-12.
- [10] 于建嵘.乡村振兴需要公众有序参与[J].人民论坛,2018(12):74-75.
- [11] 张文明,章志敏.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2018(11):75-88.
- [12] 伍茜溪.供给侧视角下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探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8,34(4):11-19.
- [13] 朱敏.培育壮大新动能需完善相关配套政策[J].中国发展观察,2018(1):39-40.
- [14] 刘明睿,孙秀梅.我国低碳农业发展新动能培育机制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8,46(6):203-206.
- [15] 张玉强.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上海市 Y 村的案例考察[J].东北大学学报,2019,21(5):497-504.
- [16] 武小龙.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8-26.
- [17] 侯刚.乡村振兴背景下贫困村攻坚新动能培育研究:基于对 S 省 Y 市的调查[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19,19(1):62-65.
- [18] 渠鹏飞,左停.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55-61.
- [19] 王怀禹,刘强,刘鉴峰.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研究:基于阆中市五龙村的案例考察[J].农业信息,2020(6):105-107.
- [20] 马荟,庞欣,奚云霄,等.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20(3):28-41.

Study on Dynamic Mechanism of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Setting Daicun Village Community in Lanling County

in Linyi City as an Example

SHI Zhenling¹, SHI Xiuxiu², WANG Xiuyong³

(1. Lanling Bureau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nning, Shandong Lanling 277700, China; 2. Jiangsu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Jiangsu Nanjing 210036, China; 3. Fulaishan Geological Relics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Service Center in Jvixian County, Jvixian 276500, China)

Abstract: In some areas, rural governance 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with resources input is often lack of internal motive force. The income of the villages has been increased weak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oretical origin of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mobilization, relying on local sustainable resources, playing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farmer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rural development is excav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is constructed, and four key elements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have been summarized, they ar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local resources and culture,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and bene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aicun community in Linyi city,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has been made.

Key Word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dynamic mechanism; social organization; local resources; benefit distribution